

書

叢

鳴

鹿

建安七子



责任编辑 徐耕白
封面设计 蔡 晟

建安七子

余斯大 选注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70000 印数:1—5000

ISBN7—80520—784—4

I·413 定价:15.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河西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鹿鳴叢書

建安七子

竹林七賢

大歷十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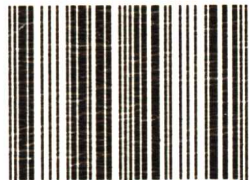
眉山三蘇

蘇門四學士

吳中四子

揚州八怪

ISBN 7-80520-784-4



9 787805 207841 >

余斯大 選注

岳麓书社竭诚使广大读者
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三国演义

水滸全传

西游记

红楼梦

四大古典小说(盒装)

宋十大名家词

六朝十大名家诗

清八大名家词

唐宋八大家文

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

儒林外史

聊斋志异

三言(足本)

二拍(足本)

十八家诗钞(上、下)

容斋随笔

文选(上、下)

诗集传·楚辞章句

周礼·仪礼·礼记

商君书·韩非子

搜神记·世说新语

老子·庄子·列子

四书集注

孙子兵法集注

东坡诗·山谷诗

焚书·续焚书

王右丞集·孟浩然集

李太白集·杜工部集

白居易集

左传

国语·战国策

吕氏春秋·淮南子

山海经·穆天子传

水经注

三曹集

唐宋传奇集

史记

汉书(上、下)

后汉书(上、下)

三国志(上、下)

晋书(上、下)

旧唐书(全4册)

新唐书(全4册)

明史(全6册)

太平广记(上、中、下)

春秋繁露·天人三策

梦溪笔谈

剑南诗稿

徐霞客游记

词综

社址:湖南省长沙市河西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电话:0731—8884295 8864642

编辑缘起

一九九六年岁末，正是岭南梅萼溢香的时节，我参加深圳书市，得遇老友徐耕白。耕白兄是岳麓书社编辑，我们所谈，当然以书为主。这一夜，从华灯初上到云淡星稀，我们商量编一套古代诗文丛书。然而，目下古代诗文集本如过江之鲫，我们如何出新呢？

我们以为，诗文以风格区分者，古已有之，今不罕见。如梁简文帝标宫体之目，杨亿、刘筠主西昆之派，乃至宋词有豪放、婉约之分，皆为此类。以地域区分者，古已有之，今不罕见。如《隋书》明江左、河朔之辩，刘师培申南北文学不同之论，乃至江西诗派、桐城义法，皆为此类。以时代区分者，古已有之，今不罕见。如唐诗有初盛中晚之论，宋词有南北两宋之说，乃至元和新体、大历诗风，皆为此类。而以群体区分者，古亦有之，而现今选本则较为罕见。

所谓文学群体，即生活在同一时代社会环境下的有一定关系的文学同道。他们或为朋友，或为师生，或为亲属，切磋琢磨，诗文相激，史所称艳，人所乐道。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眉山三苏、苏门四学士、公安三袁、吴中四子、扬州八怪等等，既有典可据，亦光耀夺目，宛若文学星河中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然而奇怪的是，这方面的诗文集本却较为少见。基于此种考虑，我们决定编辑一套文学群体的诗文集，本《诗经》「呦呦鹿鸣」，求其友声之义，取名为《鹿鸣丛书》。

历时年半，现在丛书已推出第一辑。坦白地说，我对这套书确有一点敝帚自珍。这倒不是其中东倒西歪屋，零落琴剑书，竹影横斜半帘风那般古意沁人；也不全是其中月夜榭廊，冰肌无汗，杏花影暗玉人箫那般旖旎煽情。我觉得，贯穿其中的「群体」是一根看不见的线，线之末梢系一片云水，如轻烟，如惊鸿照影，浸淫其中久之，对于理解中国文学史当是别有会心的。

在选材方面，我们诗词文赋均收，思想性、艺术性兼顾。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附作者小传和简注。记得六年前钟叔河先生指导我注释唐诗，排印时就只将诗句分隔而不作标点。照钟丈的话说：「标点都是后人所加，去除后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古人之意吧。」我们这套书一本钟氏之旨，诗词均只分句而不标点，这也可算是一点出新，请读者诸君鉴察。

这套书的编注者都是古典文学工作者，由于水平有限，缺点在所难免。然而，我们的工作是真的。尽管「认真」这两个字被某些人厌弃。或者嫌它过于沉重，或者责怪它束缚了自我。宋人诗云：「古人冷淡令人笑，湖水年年到旧痕。」我想，古人当是不会取笑「认真」的。

以上谨略叙《鹿鸣丛书》编辑缘起、义界、体例及从事者的态度，尚祈十方大德，不吝教之。

建安文苑 七子风流 (代序)

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作家众多，多集中在曹氏集团周围，「七子」便是这一群作家中的重要成员，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孔融，《后汉书》有传；王粲，《三国志》有传，其余多附在《王粲传》中或散见于他人之传。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一九六—二二〇）。东汉末叶以后，多数皇帝幼小，局势日趋混乱，外戚与宦官两大势力迭相掌权，他们相互倾轧，杀戮，作恶多端，豪强地主的势力也日益膨胀。到东汉末年，社会一片黑暗，是非颠倒，民不聊生，经济凋蔽，邪恶横行，终于在公元一八四年爆发了黄巾军农民大起义。各豪强集团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乘机壮大自己，形成各自割据的势力，汉代也名存而实亡了。在混战之中，曹操于建安元年胁迫献帝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操任大将军，封武平侯；建安十三年任丞相，建安十八年封魏公，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汉朝政权的实际把持者。经过近二十年的东征西讨，他扫除了长江以北的各部豪强，统一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二二〇年，曹操死，子曹丕继

位，逼献帝退位，自己称帝，国号魏。刘备、孙权也相继称帝，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时的局势与晚周有几分相似。连年不断的战争，一方面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形成「旧土人民，死丧略尽」①、「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②的悲惨景象；另一方面，也给一些士子学人提供了择主而栖，以图一展抱负、济时匡世而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大好舞台。三国统治集团为了各自的目的，都积极招揽人才，其中曹魏集团尤其甚。两汉时期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随着汉代的分崩离析，儒家思想对社会及人们思想的箝制作用在逐步减弱，人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曹操首创其风，提出「唯才是举」，哪怕是「盗嫂受金」者也「得而用之」，「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③者，他也量才而用。这不仅仅是反儒家传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生机，还给广大士子进入仕途扩展了道路。在那个时代，要想施展才华以遂壮志，而不进入仕途几乎是不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七子等作家便渐渐地集聚到曹氏父子周围，形成了一个邨下文人集团。

「七子」之名是曹丕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典论·论文》中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璉，东平刘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从此，文学史上遂七子并称。七人中，实事求是地说，孔融不应计在内，他与其他六人不同。他比六人年龄要大，时间要靠前一些，与其他六人并无来往。他死于二〇八年，值建安

十三年。另外，孔融不仅未曾投靠曹操，也未曾成为曹操的僚属，他还多次反对曹操，嘲讽曹操，终被曹操所杀。而其余六人都曾为曹氏效力，有的成了曹氏的御用文人，因此，孔融不应属曹魏文学集团，只是因为曹丕把他们放在一起论说，才合称「七子」的。当然，孔融与其余六人都生活在东汉末年，都经历了同样的动荡与不安，因而都对现实不满，其作品也同样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色，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孔融虽不以诗见长，然而其诗作也自有过人之处。《离合作郡姓名字诗》虽近游戏之作，但也寄寓了深深的感叹。《杂诗》二首，一写人生的际遇，睥睨千古，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渴求建功立业的豪气与对世道不平的怨气，莘莘不凡；一写对亡子的悼念，情真意切，凄凉悲惨。虽《文选》注中多处出其诗句以为李陵作，真伪莫辨，但纵观全诗，与李陵生平思想并不相类，与建安时期的诗作倒更吻合一些。《临终诗》是他绝笔之作，揭示了当时「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的黑暗现实，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孔融在当时为人称道的是文，曹丕评之曰「体气高妙，有过人者」④。曹丕说「文以气为主」⑤，体现在作家本身的谓之「气」，表现于作品之中的谓之「风骨」。孔融正是在这一点上有过人之处，其文表现出东汉末年一个儒家士子的耿介之气。他敢于议论，在《肉刑议》、《圣人优劣论》、《汝颖优劣论》等文中直抒己见。他爱才敬才，《后汉书》本传中说他到北海郡「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邴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其余虽一介之善，莫不加礼焉」。从《荐祢衡表》、《喻邴原书》、《论盛孝章书》等文中可以看出他敬贤的真诚。他不畏强权。当时曹操的权势，炙手可热，他在《难曹公禁酒书》、《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中戏谑无忌，故而曹丕又说他

「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⑥其实他只对曹操，其他文章并不如此。他的文章，给汉末散文的发展带来了转机。正如俞绍初先生指出的，孔融是「汉末清议之士向魏晋名士转变的代表人物」^⑦好议朝政，不拘小节，又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以之行文，故气盛而不野，情真而不滞，典雅而不虚，华美而不浮。孔融持论虽高，却不切时务。他任北海太守，袁谭已攻进了城，他却「隐几读书，谈笑自若」^⑧，直到城池陷落，他才逃奔山东。他又不受曹操笼络，常常捣乱，所以终难逃出被杀的结局。

除孔融外，其余六人从经历到创作的共同点就更多一些。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战乱，目睹了百姓的悲惨，因而他们的笔触都能直接指向现实，反映社会，无所顾忌，畅所欲言。这是包括三曹等在内的建安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最为可贵的地方。后来这六人都先后归附了曹氏，成了曹氏的僚属，并常常随军出征，因而他们的创作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王粲原居洛阳，董卓大乱洛阳，迁献帝于长安，王粲也迁至长安。不久长安又起战乱，王允等杀董卓，李傕等又杀王允。王粲为了避难只得南下依同乡刘表，这时作《七哀诗》，描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景。到了荆州。他本怀着「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的愿望，盼望有一番作为。「惧瓠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不舍」，然而遭遇恰恰如此，他没有得到刘表的重用，怀才不遇。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可以说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他写下《登楼赋》，抒发了他不能一展怀抱的苦闷和怀念故乡、盼望国家统一的心情。这篇赋写得沉郁悲凉，直抒胸臆，与汉赋的板滞大不相同。他是建安十三年归依曹操的，十四年曹操率军东下，曹丕、王粲都随军出征，曹丕作《浮淮赋》，王粲也作《浮淮赋》，数陈曹氏

军威，「济元勋于一举，垂休绩于来裔」。他还写有《公宴诗》，赞曹操「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在《从军诗》中他写随曹操出征之乐，写到回军时，他说「军人多饒饒，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短短几句，掩盖了多少曹军抢掠和屠杀百姓的滔天罪行！其他几人也类似的情况（刘楨略有不同）。陈琳原在袁绍幕中，那时在北方，作《饮马长城窟行》，反映了北方人民修筑长城的痛苦生活，这首诗当是他亲眼所见的即事之作。在连年争战的年代，选此题材，是颇有深意的，反映了战争这个怪物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他在《为袁绍檄豫州》中历数了曹操的罪恶，甚至过分地涉及到曹操的父、祖。并不是说骂曹操才是正确，而是在这篇檄文里揭示了东汉末年黑暗的社会现实。归顺曹操后，作《武军赋》、《神武赋》、《檄吴将校部曲文》，赞美曹操「神武奕奕」，但只是赞美曹操之功德军威而已，已没有了昔时感时忧国、哀悯生民之正气了。阮瑀作《驾出北郭门行》，记述孤儿之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相传他曾躲避曹操的征召而逃入深山，曹操下令焚山，把他捉来而就伎人之列。他通音律，善鼓琴，于是抚弦而歌，把曹操歌颂了一番，曹操大喜，命他与陈琳一同「管记室」。《现存《琴歌》是后人伪托之作》各人的情况虽有些不同，但在后期的作品中反映现实的作品少了或没有了，这是事实。有的人也确实成了曹氏的御用文人。

建安文学中，三曹七子的文学创作活动带有群体性质。这是文学史上在这之前很少出现过的现象。只要翻开他们集子，很快就会发现同一题目或同一题材而大家作文的现象。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荆州，曹丕作《述征赋》，阮瑀作《纪征赋》，徐干作《序征赋》。十四年，

曹操赤壁战败，北上入淮，曹丕作《浮淮赋》，王粲作《浮淮赋》、《初征赋》。曹丕作《出妇赋》，王粲也作《出妇赋》。阮死后，曹丕悯其遗孤，作《寡妇赋》，「命王粲并作之」^⑥。十七年，曹操登铜雀台，自己作赋，并命曹丕、曹植并作。曹丕作《弹棋赋》，王粲也作《弹棋赋》，应玚作《奕势》。另外还有《马脑勒赋》、《车渠碗赋》、《槐赋》、《柳赋》等等。诗，许多人有《公宴诗》、《咏史诗》则三人均写三良殉葬秦穆公事，连观点也相同，既悯三良，又赞其忠。还有《斗鸡诗》等等。这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这固然是曹氏集团对文人的笼络，奉命作赋，奉命和赋，但是却不能简单地归之为文人游戏。文学作为社会学科中的一个专门门类经过长期的发展，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大概可定在建安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学批评，显示了这种自觉性。曹丕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⑦，文学创作能使人名垂千古，所以他说「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⑧。由此可见，他们对待创作是认真的。曹丕作《柳赋》，序中说「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柳赋》不是游戏之作，是对人生的感慨，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伤感，故而王粲、陈琳等均有和作。曹丕看到文昌殿的槐树，觉得很美，作《槐赋》，他觉得王粲值班的地方也有槐树，也美，于是命王粲也作《槐赋》，这是对美的欣赏与品评，所以他在《典论·论文》中还特地点到这篇赋作。这样一群作家诗人常常聚在一起，「徐、陈、应、刘，……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

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④文人雅集，只是一种形式，实际是一种文学创作活动。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东汉文学的继续与发展，这一时期，正是因为有了包括三曹、七子在内的一大群作家的努力，这个高潮才得以出现。作家群体的出现，是文学流派形成的基础，更是文学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

建安七子对文学是有着重要贡献的。这贡献首先就在于他们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他们的诗作多能上承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取材于他们自身经历的动乱生活，从而表现他们内心的深刻感受。他们的作品中有写民生疾苦的，有抒胸中苦闷的，有慨叹社会不平的，有抒发人生感慨的，还有表明对建立功业和理想的追求的，等等。他们有许多应用的作品，如檄、书等，更是就现实问题而纵横议论，洋洋洒洒，畅所欲言。他们这些作品没有颓丧之气，字里行间，都表现出一种充实、进取的积极精神，具有刚健清新、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色，昔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里概括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有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是非常准确的。

建安七子和三曹等作家在文学领域内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们在一起发展了东汉文学，并使文学趋向于一个高峰。就诗歌而言，他们除用乐府题外，对于五言诗这种形式，运用得更为娴熟。五言诗，现存最早的是班固的《咏史》，后人评之曰「质木无文」^⑤。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乐府诗中不少作品实际上也是五言诗，至建安而五言诗已蔚为大观。而题材之广泛，反映社会之深刻，又超过了东汉。在五言诗的发展上，七子

早于曾植，功不可没。就赋言，汉大赋之同时及以后，班彪、张衡、蔡邕、赵壹等都写抒情小赋，或借物言志，或寓情于事，或直言无忌，或比兴感怀，都情真意切，然而题材不广。七子之作，留下的赋题很多，可惜不是散失就是剩下残文，完整地留存下来的几乎只有王粲《登楼赋》一篇。从赋题看，较东汉为广。就艺术性而言，南北朝有「文」、「笔」之辨，赋是列入「文」的。「文」尚辞采韵律，追求典丽，七子之赋，正是如此，尤其是咏物之赋。《登楼赋》却不如此，不仅结构完整，章法严密，且一反汉代「铺采摘文」之风，朴实精粹，自然流畅，文气从容，不露筋骨，确实是赋中精品，开六朝小赋风气之先。说到散文，此时又是一大变。刘师培说：「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迨及建安，渐尚通脱」^④，他又说：「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⑤。他的概括是十分准确的，一是「清峻通脱」，一是「骋词」。所谓「清峻」，鲁迅先生说「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⑥，即不要烦词芜句，话说明白即可；所谓「通脱」，鲁迅先生说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⑦直言无讳。曹操的文章如此，孔融的文章也如此，少粉饰，多吐真情。七子中多数文章以骋词见长，或慷慨高厉，或溢气空涌，由简趋烦，渐流繁富。如陈琳之文，每言一事，必用典故，用典又多为偶数，虽是书檄，也富有感情，带有纵横家雄辩之风与汉赋铺张扬厉的特点，这就是刘勰说的「梗概而多气」。句式又多排偶，开六朝骈体之先河。

建安七子，原来有集，曹丕似曾参与其事。后多散失，明清多有辑本。俞绍初先生绍前人之功业，搜遗补缺，成《建安七子集》，到目前为止，这是最为完备的本子。本书就是以

此为底本编选的，说明如后：

一、因俞本已注明辑处，这只是选本，不注辑处。有必要说明的，在篇后注解①中说明。

二、作品中间有辑于另处加以搭接者，俞本用方括号标示。本书采用其文，不用括号。

三、俞本每人按诗、赋、文顺序编排，本书为与丛书统一，按文、诗、赋的顺序编排。

四、由于原作缺失严重，有的只剩下几句残文，我们一般不选。

五、有的篇章保存较多，另有残句未能衔接，我们只选用前者。

六、王粲《英雄记》是清人黄奭辑本，历来只作为附录而缀于后的，我们选了一些叙事上颇为精彩的篇章，为读者提供王粲作品的另一种样式，以便有更全面的了解。

七、徐干的《中论》，全部收入。

八、在注解上，我们一般只注明词意，不注出处与典故。但有些典故，不注明则不晓其意，我们视情况而定。

选注一个好的本子确非易事，由于种种原因，加上选注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方家指正。

余斯大 一九九七·九·一八

【注释】

- ①曹操《军谡令》。 ②曹操《蒿里行》。 ③曹操《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
 ④⑤⑥⑩⑪曹丕《典论·论文》。 ⑦《建安七子集·前言》。 ⑧《后汉书·孔融
 传》。 ⑨曹丕《寡妇赋序》。 ⑫曹丕《与吴质书》。 ⑬钟嵘《诗品·总论》。
 ⑭⑮《中国中古文学史》。 ⑯⑰《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